

本旧作时取的。《黄帝的咒语》、《乌盆记》和刚刚出版的《扫鼠岭》都不在其中。我迄今为止出版的八部长篇小说，在主要人物和人物关系的推进上都是有联系的，但每本都有独立的故事情节，所以单独阅读也没有问题。

《新民周刊》：在报社工作十年，2010年你为了创作决定辞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写不下去怎么办？一开始生活的压力也很大，家人有没有埋怨？还是给了你很大的鼓励？

呼延云：2010年我出版了《嬗变》和《镜殇》之后，对自己有了一些信心。我那时在报社当上记者部主任，工作很稳定，但是我一想到终于通过写作推理小说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虽然年纪大了些（那一年我33岁），还是下决心辞职，全力投入到创作中去。

在辞职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任何收入，全靠过去工作的积蓄和家人的支持。我一直属于对物质生活要求极低的人，饭吃饱就行，衣能穿就行，所以也好养活。我那时刚刚结婚，第二年有了孩子，在报社工作时的一些积蓄很快花光了，偏偏我接下来的两部作品：《不可能幸存》和《黄帝的咒语》都遇到出版上的困难，我干脆一边写作一边打工：编杂志、做公号、跑会务、当代课……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七八年。也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我接触到了社会上不同的人，体验到了各种艰辛与不易，这些都是我过去在报社大院里完全不了解的，这段复杂的生活经历，很多都成为我后来创作的素材和源泉。

《新民周刊》：你的早期作品

争议很大，读者的批评很多，但从《真相推理师·复仇》开始，你的作品的口碑越来越好，你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

呼延云：单就艺术作品的创作而言，我始终认为，探索比成功更重要。

以推理小说为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大师迭出，流派纷呈，其内核具备相当的稳定性，很容易使后来者受到吸引，从而在创作上产生模仿和固化。我出道时雄心勃勃，决心写出跟以往完全不同的推理小说，经过仔细地思考，我认为如果想有所突破，就要在构成元素上更加多元化，在叙事方法、叙事模式与叙事结构上加以变革，因此从《镜殇》开始，我就有意尝试着用更加大胆的方式进行创作——不管是传统文化中的边缘文化为题材，还是基于现实场景下的超现实人物设定，抑或在叙事模式上的一些反常规操作，都可以看成是朝着这一目标所做出的努力。

虽然这些努力受到了读者不少批评，但我认为，既然是新鲜事物和试验性质，就不应过早地否定和放弃，所以在一定时期坚持这样的风格。

本格派为体，社会派为魂

《新民周刊》：刚刚出版的《扫鼠岭》，比2018年大热的《真相推理师·凶宅》的口碑还要好，业内预期这可能是2020年爆款的原创推理小说，那么，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作品？

呼延云：如果说《扫鼠岭》和

我之前的作品有什么不同的话，可能是因为题材过于沉重，我在创作时完全放弃了玄奇的诡计和复杂的逻辑，而是采取了一种比《复仇》更加写实主义的手法。虽然小说的故事、地点、情节、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在描写细节时，我把自己在社会上“飘着”的那些年经历过的和遭遇到的一些人和事还有近年来对现实的一些思考和感受都写了进去。

《新民周刊》：你是不是对本格推理情有独钟？在《扫鼠岭》出版后，有的读者认为你要向社会派转型，是这样吗？

呼延云：从《嬗变》开始，我的每部推理小说都会反映一些现实问题，比如《镜殇》中的文物走私与拍卖黑幕、《不可能幸存》中的保健品问题、《黄帝的咒语》中的人体器官盗卖、《复仇》中的青少年犯罪、《凶宅》中的房地产乱象……我也一直在尝试怎样能写出本格派和社会派结合得更好的作品，虽然在写作方式上不断调整，但“本格派为体，社会派为魂”的核心思路是不变的。

《新民周刊》：如何设计悬疑桥段？反转又反转已经成为了悬疑小说的套路，如何让这种反转出乎人的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下图：呼延云作品《扫鼠岭》、《真相推理师》。

